

中原时评

■个论

“居住年限”如何成为市民化的“班车”？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徐平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将通过建立居民制实现市民化。国家将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稳步推进城镇的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并使这五大公共服务覆盖城镇常住人口。(3月24日《新京报》)

居住证制度是户籍改革的内容之一,最早在广州、上海等大城市试点,2010年5月27日国务院转发了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随后,深圳、北京等一批大城市相继施行。

然而,居住证制度不等于城市户口,取得了居住证可享受一个城市工作生活的某些便利,但不能完全享受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的公共服务,仍然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计。不少的城市,将居住证制度与积分落户结合起来,作为城市提供公共资源的依据,而持有居住证是获取积分的一个前提。显然,一个外来人口想要成为城市的居民,需要跨过两个门槛,更需要闯过更多的条

件壁垒。

如《上海居住证积分办法》第三条规定,《居住证》积分制度是通过设置积分指标体系,对在本市合法稳定居住和合法稳定就业的《居住证》持有人进行积分,将其个人情况和实际贡献转化为相应的分值。积分达到标准分值的,可以享受相应的公共服务待遇。

这些规定,意味着城市对市民化有着苛刻条件的选择,说得不好听点,就是“高知、高收入群体”的城市化。比如东莞人子女积分入学的两项主要指标是父母的学历、职称的高低。这些群体对城市的贡献足以买单城市公共资源的增量,而绝大部分处于产业一线、服务业等低收入群体被挡在了市民化的大门之外。

不能不说,当下的城市化是嫌贫爱富的城市化,也是城市“零付出”的城市化,这也是户籍城市37%与常住人口城市化53%差别的根源所在。城市化不仅是选择性的吸纳,更是包容性的反哺。相比较而言,城市在反哺方面做得很不够,城市在吸纳大量外来人口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将部分财富用以解决对称承载

的公共服务建设,而是因袭了“摊大饼”式扩张的路途,浪费了不少的公共财力。

以人为本的城市化面临的根本难题只有一点,那就是公共投入的成本由谁来买单,而城市缺少足够的意愿,始终都是问题的关键。理论上讲,发改委提出的“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逐步实现市民化”,可以视作城市化的“路径图”,一方面正视了城市化资源供给的瓶颈,有计划地分批解决;另一方面简化条件,以年限作为基本标准,可以最大限度确保“机会公平”。而关键是来自顶层的设计,如何能够内化成城市的动力?

毫无疑问,城市化在强化顶层设计,打破户籍壁垒,简化入户条件,促进流动的制度公平的同时,还需要一个不以城市意志为转移的倒逼投入机制,如加大社会保障国家层面的统筹力度,打破教育的城市樊篱,健全社会福利,推进公共服务社会化,运用税费、补贴的分配手段,通过无形的手来配置城市化公共资源,让“居住年限”真正成为市民化的“班车”。

□木须虫

■街谈

孕育大师土壤须突破利益障碍

赶上了文化发展的“史上最好时期”,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文化“成长的烦恼”,在人民出版社近日推出的《文化热点面对面》一书中,文化部部长蔡武直指要害,行政权力对艺术的发展不要过多干预,才能促使文艺大师的涌现。(3月24日《京华时报》)

从新闻上看,文化部长对于行政权力不应过于干预艺术颇为认可,这表明在如何创造条件孕育大师方面,其实官方与民间并无过多分歧,只是就现实而言,从认识到实践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钱学森弥留之际留下的追问——中国为什么难以诞生大师,见诸公共舆论场已有数年,相关文化领域的配套改革仍拘泥不前,这表明在文化领域想要进行改革,除了需要突破观念性障碍取得更多共识外,还需要更加大胆地突破既得利益障碍。

当然,文化高雅而高贵,说其存在利益障碍,一时恐难令人接受。但当今社会的经济机制全盘进入市场经济后,文化领域事实上很难孤芳自赏,自成体系。它必然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出牌,只是由于文化管理体系并未跟上时代步伐,在新经济体系下所产生的文化利润,容易激化管理者的异变情绪,孕育出权力与文化的暧昧怪胎,助长部门利益的生存空间,这就使得少数文化管理者很难有主动放下行政审批权的勇气。

破除这样的利益障碍,必须理清权力与文化的关系。按照制度文

明的概念,权力之于文化的关系,不应是高高在上的管理与被管理,而应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一年两万多首歌曲,脍炙人口的寥寥无几。数以万计的文化节目,能走出去的屈指可数。文化高产低质的背后,是市场对选题的跟风,更是市场围绕权力指挥棒的结果。欲从文化高产大国成为真正的文化大国,需要相关层面有更多的文化自信,斩断权力与文化的暧昧纠葛,推动行政权力回归服务者角色,为文化的繁荣搞好服务,创造更多的利好条件。比如“将政府的评奖压缩到最低限度”、“积极推动国家荣誉制度出台”等。

权力对文化进行管理是必要的,只是这种管理应该建有权力清单,有章可循,公开透明。当行政权力处于自我魅化的状态时,破除利益障碍是艰难的,因为信息不对等,对于来自权力的干预,普通人很难进行是否符合程序的判断。只有文化市场主体,知道哪些权力属于哪些部门,哪些能管,哪些不能管,其对于权力的过多干预,才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监督力量,才能使那些假“正义”之名谋个人私利者难以遁形,而这必然改变目前依靠模仿跟风成功选题探知底线的局面,自然会激活文化创造热情,推动文化的繁荣。也就是文化部长蔡武所说,“标准定好了,观念转变了,文化艺术的大师就在眼前”。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个论

给铁老大火车票打折点赞之外还有期待

3月20日起,中国铁路总公司自主运营的12306火车票售票网站正式开售打折火车票,截至目前已有556个车次的部分空闲车票可享受折扣优惠。据中国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的公告显示,2014年3月20日至12月31日期间(9月30日至10月7日除外)始发的部分旅客列车末端空闲卧铺执行优惠票价,此次优惠涉及全国范围内556个车次。(3月24日《财经》)

中国铁路公司对国内556个车次的卧铺,实行车票打折,幅度之大,车次之多,不仅意味着铁老大开始低下高昂的头颅,放下身段走市场化道路,也体现出铁路部门开始打低廉票价牌来吸引乘客,避免过高的空驶率。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应当给铁老大点个赞。

按照此次优惠政策,200公里内硬卧优惠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170%计算,软卧优惠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270%计算。200公里至400公里间硬卧优惠价按照该次列车对应硬座票价的158%计算,软卧优惠价按照该次列车对

硬座票价的258%计算。对此,有网友算了一笔账,以K484昆明至广州为例,这趟列车的优惠区段为“茂名东——广州”,硬卧原来全价为104.5元,打折后(即按对应硬座票价的158%计算),买这段路的硬卧优惠票价为84.5元,而汽车票则是120元。两者相比,乘客无疑是受益者。

不过,我们在给铁老大点赞的同时,也应看到,火车票打折,仅限于特别时段,特殊座位,个别线路,不仅对线路整体客流量影响甚微,也不能体现出铁老大的诚意。而反观国外,一些国家的做法很值得借鉴。譬如,西班牙在制定浮动票价时,不像我国铁老大打折一样,依据淡季旺季或特殊座位,进行“半市场化”调节。而是根据市场情况,随时随地、灵活调价,以不浪费铁路资源和利益最大化为初衷。具体点讲,西班牙铁路票价的浮动幅度极大,不仅早订晚订不一样,上班时间和下班时间也不一样,工作日和周末更不一样,8月度假期和圣诞节长假期的价格更是全部上浮。反之,节日之后铁路

票价大幅下降,甚至会低得令人不可思议。正是这个低价策略让上班族和退休族,岔开外出时间,区分出高峰期和低谷期。这样分制后,西班牙火车几乎每天满员不空驶,很快让铁路驶出了财务危机,开始慢慢赢利。

当然,我国与西班牙的国情完全不同,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习惯,还是人口数量都相差很远,但这并不妨碍中国铁路学习“西班牙好榜样”。我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措施。譬如,把打折票价覆盖到国内的所有铁路,所有车次;再如,打折不能局限于“末端空闲卧铺”,普通座位也应推出折扣票价;打折也要像国外那样,尽量细化一些。比如,紧张线路折扣小些,空座率过高线路折扣大些;此外,西班牙针对中高收入阶层,8月度假期和圣诞节长假期的价格全部上浮,而我国中等以上收入群体,大都在黄金周和小长假出行,此期间应实行票价上浮;在春节期间,由于主体是农民工,不妨实行全年铁路最低折扣价等。

□吴睿轲

■街谈

严格执行标准 资源离任审计才有实效

西安市领导干部如果执政期间所辖地区发生严重生态污染问题,即使离任了也将承担责任。西安市政府日前召开的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会议透露,西安今后将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根据改革方案,西安市将研究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3月24日新华社)

“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并非新的制度创设。于此方面,上层决策早有针对性表述。而西安的最新尝试,不过是将自上而下的宏观部署,加以落实和具象而已。然而遗憾之处在于,透过西安市府只言片语的陈述,公众仍旧未能窥见更多的操作细节。当然,我们对于此类正在发育、尚未成型的制度,应抱有足够耐心。一旦其真正健全,势必能对自然资源的保护产生极大助力。

因决策失误,而导致自然资源被挥霍、被破坏之事,时有发生。恰是基于此,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无疑很有必要。此一机制框架的作用,乃是多方面的:一来,事前预警,抑制官员盲目透支环境、超前开发资源的冲动;二来,事后追责,一改过往“有人破坏无人补偿”的游戏规则……理论上,生态环境损害终身追究制,势必倒逼官员任上更为节制、审慎。

本质上,任何地域性的自然资

源都是公共财产,然而在现实中,其往往沦为官员的“个人资本”——被用来刷数据和成绩。很多时候,那些标榜大手笔、有魄力的资源利用行为,常常功利而短视。虽能带来迅速回报,却极大透支了未来的发展潜力。其实,当有限的自然资源,没有沿着传承有序、逻辑清晰的思路来开发,而是任由官员的个体意志和一时之需主宰,酿成种种悲剧实在不足为奇。

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虽未有明确的操作方案公布,但其或将面临的种种阻力,早可预见。公众普遍存疑的一点是,由谁发起审计?会否又陷入下级监督上级的窘境?毕竟,离任官员不少是获得升迁,由此更凸显了所谓“审计”的弱势!除此以外,我们同样疑惑,将以怎样的标准,来评价官员的资源利用行为?若严谨来看,其间必然涉及一系列的费效测度、后果评估等专业运作。

当然,现实语境内的“环境追责”,或许还仅限于“发生严重生态污染”的前提下。问责启动门槛如此之高、审计执行标准这般宽松,其实际约束力几何,着实可疑……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凡此种种自然比过往的“放任自流”局面要合理得多。只是,若本着最大程度避免政府行为损害生态环境的考量,所谓审计和问责,本应更为较真、更加苛刻才是。□然玉